

我所认识的喇嘛

王尧

在藏区，有一个非常奇特、引人注目的群体，由一群男性组成的非农非牧、专门读经念佛、参加或者组建法会的人群。他们分属于各个寺庙、不同宗派。老的，怕有七八十岁了；小的，只有十多岁。他们共同的标志——穿着或披着绛红色的袈裟。这一队队红色的人群，被人们统称之为“喇嘛”，其实是不准确的。“喇嘛”（bla ma）是这个群体里的高层人士，意思是“上师”、“高僧”、“大德”，还包括转世活佛和一些领有高级学位的统称“格西”（dgebshes）的人。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为“喇嘛”。

这些人当喇嘛，有的是为了献身佛教，有的是为了弘传佛法，有的是为了探讨阐明佛理，有的是为了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更多的，是为了学文化、学知识或为了生活。进入寺庙，皈依导师，刻苦学习，到了一定时候会向高级层次攀登。其中一部分优异者，到拉萨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或者第四大寺（扎什伦布寺）去游学，进入某个扎仓（学院），在某个康村（系科）入学、攻读，完成“五部大论”（《入中论》《现观庄严论》《量释论》《俱舍论》《戒经》）的研读、解经。就有可能获得某一级的格西学位。当然，最高的“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则需要在每年一度的“传召大会”（smon lam chenpo）上获取。这可以说是万人瞩目的盛事，几乎相当于“一举成名”的科举折桂。

这样的群体，年复一年，在藏区成为了特殊的人群，社会地位高，备受人尊敬，与官府打交道，就是一种身份。总之，是一股社会力量。对于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在社会上的作用，值得认真地研究。这里，介绍几个侧面、断面，叙说我和几位喇嘛的交往。

（一）贡噶活佛

1952年春天，当我们获知要进藏了，要到贡噶（Gangs dkar）雪山上去投奔贡噶活佛了，心中十分兴奋，也夹杂着些许惶恐和不安：贡噶雪山路途遥远，怎么去？从哪里去？经过哪里？贡噶活佛是一个怎样的人？能接受我们吗？经过火车、轮船、汽车一路来的颠簸，行军安排，终于要乘马进山了。横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在藏区能否习惯？还有与“活佛”相见将会怎样？真与贡噶活佛见面时，他那样慈祥和蔼，面带微笑地用温热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说：“啊！你姓王，藏名就叫旺杰——旺堆杰伯（dBangvdusrgyalpo）。”说着还口中喃喃有词，念了几句咒语给我，算是一种祝福吧。于是，我的藏名就这么定了。懵懵懂懂、精神恍惚地记住了我的藏语名字——“旺杰”（dBangrgyal）。此后若干年，因为在藏区工作的关系，人们就加上了“通司”（译者）二字。于是，我就成了“通司旺杰”了。在藏区多年，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认识了很

多朋友，走过不少地方，就小有名气了。

在我们之前，进山求教于贡噶活佛座下、礼拜上师的人很多，有陈健民、屈文六和张澄基几位。他们都是学佛有成的人，尤其是陈健民著有《曲肱斋文集》16卷传世。张澄基是张笃伦（官拜西昌行营中将主任）的儿子，也是国民党监察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幼女的东床快婿。著译有《佛学今论》、《米拉日巴全集》以台湾版传世。他在海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是 C.C.Karma Zhang。我进山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分别从印度去了台湾，再转去美国。还有一位出奇的女法师，据说是满洲贵族，名叫申书文。她在贡嘎山学佛以后，到了台湾，自称“贡噶老人”，建立了一所“贡噶精舍”，也算是一件盛事。

当时，与我们一起拜在贡噶上师座下的，还有德格人南喀诺布（洛代活佛）。那年他19岁，是个极为聪明能干的青年，喜欢学习新事物，也对我们的到来有强烈的新鲜感。后来，在1957年，他到锡金弘法，住在噶玛巴下院——戎德寺。阴差阳错，离开了祖国，辗转到了意大利，成为欧洲著名藏学家图齐（G.Tucci）教授的藏文助手。实际上，图齐正是依仗他，解决藏学上的不少疑难问题的。再后来，他成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语文系的主任教授。当年，我们在贡嘎山上共同生活，丰富多彩。他主动要求学习汉语，很快就学会了汉语的拼音符号和一些常用语词。他有另外的任务，用藏语德格方言教授当地集中学习藏语文的一班同学。当时，我们称呼贡噶活佛是“老活佛”，他是“小活佛”。

在山上，贡噶上师给我们设置了课程，知道我们是专门学习藏族语言、文化、历史为主的学生。他做了如下安排：第一门文学课程，《萨迦格言》。这是13世纪萨迦派的大师萨迦班智达的传世名著。深入浅出，颇多人世教诲，设身处世，多有关怀。这部书，可真启发了我对藏文化的兴趣。全书共7大章，计457首格言，每首4句。前两句训言，后两句比譬。巧言为训，饶有趣味。我贪婪地学习，后来把它们一一译成汉语。巧得很，后来被《人民日报》编辑部看中，连载刊登，每天两首，几乎登了一年。第二门史学课程，《米拉日巴传》。这是噶举派圣者米拉日巴一生的传记。从凡夫经历磨难，到最后修得正果，即身成圣，是藏传佛教徒的典范样板。他的传记平白如话，把人生的苦难一一道来。尤其是记叙父死，母亲携孤儿幼女，家道中落，受尽欺凌的人世沧桑，历尽苦难，悲痛难言。米拉日巴受到母亲的刺激，发誓学法报仇，也取得了应验，使仇人三十余人失去了生命。杀害生灵的痛苦经历，令他幡然悔悟，痛悔前生，最后归依正法，获得正果。我在学习中欢娱尽兴，平日也十分有味，真是上了佛教与人生的最重要一课。第三门课程，《释迦牟尼佛赞》，这是贡噶活佛自己的著作。它以诗歌体歌颂佛陀的一生，每段以偈赞歌颂，再以长行进行叙述，夹叙夹议，穿插很多故事，也是饶有趣味。让我初次了解到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也初步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以上三本书，可以说为我铺垫了在藏学上的坚实基础。有时，贡噶活佛安排了噶玛堪布，详细地讲解、辅导。寺内的出家师父们，也不时地予以帮助，嘘寒问暖，从生活上到语言上，无微不至地关怀。

在山上，虽然生活上是清苦的，但精神上是欢愉的。再如节日活动，如藏历年，我们在山上，

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庙会的信众共同欢度。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们的领队斯那尼玛同学，一起到附近的牧场参加一个婚礼。那个场面，我第一次见到。在牧场上的一座帐篷里，挤满了人，来自四面八方的藏胞，见面时礼拜、问候，笑语连篇。帐篷里烟雾腾腾，木柴生着旺旺的火，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后来，斯那尼玛和我代表我们同学，给新婚夫妇送上礼品、哈达和四块银元。在欢腾笑语中，赞礼人站在台上，大声唱道：“喂，大家听着，是贡噶上师的弟子，来自北京的学生们，送来吉祥的哈达和喜庆的白洋。”台下一片欢笑。斯那尼玛和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欢乐。那一个晚间，我们生活在欢乐的海洋中，不停地传送青稞酒、牛羊肉，听着歌舞，尽情欢唱。后来，斯那尼玛拉我走进欢乐的队伍，我开始什么也不会跳，不知不觉就学会了。从此以后，我对西藏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还给《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报道，叫做《难忘的牧场上的婚礼》。

到了1954年，贡噶上师在侍者阿旺诺布陪同下，驾临北京，应邀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以教授的身份讲学。当时，他的寓所十分繁忙，有李济深、陈铭枢、梁漱溟等国家领导人或社会名流前来拜谒。原来，上师曾于三四十年代几度在庐山、昆明、南京、上海弘法，设坛授戒，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荣获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国师”（辅教广觉禅师贡噶呼图克图）荣称。

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贡噶上师担任藏文翻译处顾问，我作为学徒随侍左右。那时才知道时代的演进，以及在语言上如何跟进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宪法》在内的五部大法，在翻译过程中，语词审定、决定译名、确立标准、选择方言等一系列问题，上师躬自参加讨论，最后确定，十分辛苦，使我增长不少知识。以“人民”一词为例，究竟用 mi mang、mi ser 还是 mi dmangs，究竟从历史语言学上用哪个词，煞费苦心。最后确定，使用 mi dmangs。政府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上师非常高兴，他虽到过上海，但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坐在海岸边，在海水里打弄，甚为开心，连说：“这是嘉措（rgyamtsho，大海）！”一望无际的海上风光，令他心旷神怡，久久不能忘怀。

1957年初，贡噶上师坚决要求回山。上山以后，就召集弟子们交代后事，然后沐浴坐化。他真正预知了人生生命的终结，是一位自了生死的高人。他的弟子中，有格桑旺堆先生，继续完成了他在内地的教学事业，并曾帮助基督教会完成了《圣经》的藏文译本。当今的藏文版《圣经》，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另一位木雅贡布先生，也是上师的弟子。在成都、北京教学研究多年，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里完成了《藏文典籍全集类目录》共5卷的撰写工作。500多部藏、蒙作家的全集分类子目，都是他一手完成的，同时还为此撰写了作家小传。还有一位曲吉建才，原是高瓦喀寺（贡嘎山下的小庙）活佛的转世灵童。后去拉萨学经，参加了西藏工业厅工业设计院工作。他是大昭寺、布达拉宫整修恢复的古建工程师，至今仍在古建复原上大显身手。

贡噶上师是木雅（Minyag）人。据近代的历史研究，木雅是西夏王朝倾覆以后，南下逃亡的一支。他们逃到康（Kham）区，占据了一大片山沟，称为木雅。这一群人修建系列的碉楼防

卫，说木雅话。上师与阿旺诺布讲的就是这种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上师平时偏爱讲母语，在公开场合才讲藏语。上面提到的格桑旺堆、木雅贡布、曲吉建才几位都是木雅人。这批人生活在藏族中，讲藏语，私底下仍讲木雅话。据信，原有 2 万多木雅人，现已逐渐萎缩，都成了道地的藏族了。这一切，请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2003 年，贡噶上师的转世——十世贡噶活佛，从印度来访。在木雅贡布师兄的着意安排下，我在他的京东别墅里拜见了上师。说不上什么原因，悲喜交集。一方面怀念已经远去多年的上师，又眼见这位年方 26 岁的年轻的转世。一代代的传承，看样子还会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的！他已经去过贡嘎山，拜过灵塔，又在山上筹设讲堂，开办寺中的佛学教育。这一切成就，一一道来，我抑制不住泪水流淌，心头多少往事萦绕。啊！这大概就是与喇嘛结缘的人生吧！

（二）东噶·洛桑赤列活佛

1959 年 3 月发生的“拉萨事件”，我们受到了较大的震动。怎么和平解放 8 年了，在西藏会发生这么大的事件？达赖喇嘛不是国家领导人么，怎么会外逃呢？领导层和社会大众都在反思，一致认为，对西藏文化特别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必须切实地进行研究、调查和探讨，才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西藏，达到团结友好和谐的目标。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实行了平叛、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而这个制度，在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微。有时，一问三不知。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层就有了加强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动力。

1960 年初，授权由中央民族学院开办“高级藏文研究班”。据说是周总理下的手令，我们都没有见过。首先招来了本科藏文班的毕业生，要加以深层次的培养训练。于道泉先生深感责任重大，必须聘请专任的藏族高级专家，由他们来任教，才有可能解决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这样，上上下下，意见逐渐趋于一致了，几经努力，经西藏地方的配合，终于请来三位专家到京。第一位是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zang vphrin las）活佛，他是拉然巴格西，著名的历史文化专家，色拉寺出身的优秀学者。第二位是扎西仁青格西，甘丹寺宗教学台柱，因明学的掌门人。第三位是俗官文化的代表——土登格吉，曾在西藏地方政府长期任职，精通官署行文格式，讲究类似等因奉此的文书专家。离开他们，再大的活佛格西，也弄不懂官府文书说的是什么。三位专家到来，立即开班授课。

与他们所授课程相配合，还组织了一个“佛学讲座”，聘请在京的佛学专家，传授佛学知识。周叔迦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讲授中国佛教史上的十大宗派（或者八大宗派）。法尊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专家，曾在西藏游学 16 年，精通藏传佛教的历史，讲授“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与人物。喜饶嘉措大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的雕版主持人，主讲藏文古典文化系列。牙含章先生：社科院民族所所长，主讲佛教信仰和无神论问题。任继愈先生：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张克强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藏文本的《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vbyung），开课一年，以及慈恩大师的“五不翻”学说。高观如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

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文化。戴蕃豫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艺术。王森先生：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主讲“清顺治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印解读”等等。以上讲座，配合了三位藏族专家的课程，赢得了同学们和社会的关注与欢迎。许多教师也前来旁听，真是座无虚席。

在三位藏族高级导师的讲授指导下，又广泛地吸收了佛学界权威的面授讲解，后来在研究班的学生当中，出现了一批人才。如拉巴平措，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现在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杜泰，担任西藏广电局局长（现已病逝）；赤来多杰，《西藏研究》杂志主编；鄂塞，西藏档案局局长，等等。他们都是这个研究班的优秀毕业生。

研究班主讲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是一位饱学之士。自幼被认定为七世东噶活佛的转世灵童，受到尊重，迎入东噶寺供养，学习，诵经，写作。后又转入拉萨的色拉寺专门进修，并在传召大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声誉日隆。在1959年的“拉萨事件”中，他坚持留下不走。后来居然也受到批斗，真是奇怪，令人不解。他是一位头脑非常清醒、非常敏锐的学者，善于迅速接受新鲜事物。被推荐到北京，进入高等学府这个新的轨道，使他感到新奇和安慰，真正是如鱼得水。东噶先生主讲“藏文古典历史名著选”。在这门课中，他选择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记》（*Deb therdpyidkyirgyalmovigludbyangs*）作为教材。这是一部非常难以自学的书，但是它在西藏历史著作中很有地位。举例说，“太阳落，月亮升”，它要说成“金乌坠，玉兔升”。用类似这样高雅的同义词，来表现作者的文化修养。对于自学的人可是一道难关。我曾经自学过几次，总有一些啃不动的骨头，横在眼前。这次听他讲课，他在堂上眉飞色舞，大显才华，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动人。我是随堂听课，受益不浅，而且随堂做了笔记，逐章逐节翻译成汉文。可惜，译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没了。同学们跟我一样，从这门课的学习中，登上了一个台阶。从此，藏文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可以读下来了。

东噶先生在讲课中完成了他的专著，并且当堂讲授《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他的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三种汉文译本同时出现（陈庆英、唐景福和郭冠忠译本），绝非偶然。书中对于西藏长期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来龙去脉做了条理分析，认为中央王朝的大力扶持，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噶先生不仅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而且声名远扬国外。1985年夏天，他和我应邀到慕尼黑，参加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议。这个会议的主持人和主办人，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于伯赫博士和邦隆仁波切。东噶先生的到来，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问长问短，围住他问个不休。东噶先生也十分兴奋，他在开幕会上，做了一个令人出乎意外的发言。他说：“今天我能够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参加会议，感到非常光荣！”到会的藏学界朋友们感到十分怪异，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才活佛问我，东噶喇嘛是共产党员吗？我笑笑：我哪里知道！可见人们对东噶先生的诧异，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说起来，他也真是有这样的胆气。一次会后，他说：“今天晚上的自由活动，我在下面茶座静候各位，有任何藏学的问题，都可以回答。”他为中国藏学界争足了

脸面。会后我们回北京，经过苏黎世转道莫斯科，需要转乘苏航班机回国，在机场要等候6个小时。我和东噶先生在候机大厅里面转悠，巧遇在维也纳居住的刘明铨先生。他见到了东噶活佛，就跟我商量，他想拜一拜东噶活佛。后来他们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今，这两位都已先后作古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东噶先生完成了一部巨著——《东噶大辞典》(Dung dkartshigmdzodchen mo)。这是以他个人署名、独立编成的历史文化词典。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有15万条。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重病的疼痛，奋力完成了初稿，最后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撒手西去。

我和他的友谊，介乎师友之间。我真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他对我亲切如兄弟一般。在我的几本著作中，都有他写的诚恳友爱的十分关怀的序言。后来，他转回西藏大学任教，并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兼职，可惜骨癌病魔向他袭来，离开了人间。至今人们还是十分怀念这位勤恳一生的藏学工作者，他是我永远难忘的喇嘛朋友。

(三) 南喀诺布活佛

前面提到了，我们到贡噶雪山，跟随贡噶活佛学习。与此同时，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也组织了一个与我们相应的学习藏文的班次，从当地各机关抽来的知识青年在这里学习。而与此配套的是，从德格县邀请了南喀诺布(Nam mkharv nor bu)活佛，一起到了贡嘎山上。他一方面也拜贡噶活佛为师，同时还担任这个班(当时称作二班)的藏语教师。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小活佛”(只有19岁)，这是相对于贡噶活佛的称呼。

小活佛可不简单，是极其聪明的知识青年。他在家乡，自幼就以聪慧出了名。到了贡嘎山上，更是扩大了知识视野，接触了许多新事物。当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看到介绍北京以及全国新气象的图书和照片，非常感兴趣。我们学习藏语的进步也很快，和他用藏语、汉语夹杂着交流。年轻人嘛，在一起没有隔阂，交流方便，坦开胸怀，尽量吸收新鲜事物。在一年多的交往中，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比如，当时刚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他在一个星期就学习并掌握了。有一次，我把泸定桥上朱总司令的题词交给他，“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他很快地用现代汉语拼音拼了出来。这是见证我们友谊的一次交往，至今难忘。当时流行的“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无数荒草连山野，巨石满山岗”的歌，他也迅速地用汉语拼音记录下来，一起高唱。所以，他既是我们跟随贡噶活佛学习的辅导老师，也是藏语班深层次的同学。这样欢快的日子，过得飞快。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结下了难忘的友好情谊。当我们决定回北京了，他呀，坐卧不安，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谁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没有办法，只好恋恋不舍地分开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我们已经下山走了很远，他在山上呆呆地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示意。天哪，那是一位活佛朋友。

直到1981年，天旋地转，我才又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在维也纳召开的纪念乔玛(Alexander Csoma, 匈牙利人，欧洲第一位藏学家)的国际藏学会上，我的活动由新闻界在西方透露了，他也从报纸的新闻当中知道了我的信息。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都很焦急。

1986年，我在西德（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任教，突然接到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哇，是他！这位在贡嘎山上相识的活佛朋友，真使我惊喜莫名，他居然在意大利！离德国不远！谁能想到呢，这也是一种因缘吧。随后，他对我发出了邀请。我在波恩的同事、藏族宁玛派的喇嘛白马才仁，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原来他们都是宁玛派的出家人，希望跟我和妻子一起前去访问。于是，我们三人结伴，坐火车终于在罗马重逢了。这才知道，他在1956年去锡金游方化缘，1957年以后一直留在那里传教。直到1959年“拉萨事件”以后，意大利罗马大学藏学家图齐教授趁机到印度选人，就把南喀诺布带到了罗马大学，作为他的助手。事实上，图齐教授此后的藏学研究跟西藏有关的知识，可以说南喀诺布出了很大的力。后来，他和图齐教授分手了。就在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那不勒斯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至于他和图齐教授的关系，就一言难尽了。

多年不见，喜从天外飞来。我们畅叙了别后的多种遭遇，他还十分惦记着于道泉教授、格桑居冕先生，我们痛痛快快地在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其中，有时掩面悲戚，有时仰面狂笑。人生又有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接着，我也约他回国探亲。不久，他和他的夫人及一对儿女到了北京，由国家民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前往宾馆相会，然后一起到中国佛学院，请他向佛学院的学子作演讲。他主讲戒律对人生的重要意义，讲得很通俗，很有文采，很有说服力。意思是说，佛教徒最起码要遵守五戒。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妄、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人格、尊重生命。他说，止杀就是尊重生命，止盗就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尊重，止淫是对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尊重，止妄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止酒就是对清醒理智的尊重。总的说来，佛教徒守的戒律，是对人类的尊重和对社会的尊重。他的演讲，全程我充当口译，受到佛学院学员和法师们极大的欢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来解释戒律，真有意思，十分重要。后来他在北京友谊宾馆，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全体在贡嘎山的同学。

1990年，他倡导召开国际藏语藏文研讨会，胡坦教授、索南班觉副总干事、格桑居冕教授、张济川研究员和我应邀参加。同时，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也派代表参加。这样，我们终于坐下来，谈谈藏族语文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新的语词，新的概念，藏语如何翻译和创造，固有的语词如何适应新的变化。大家坐下来商谈，虽然也有一些激烈的言词，但总的说来还是心平气和的，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使国内外新词口语逐渐接近。开会地点，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做“阿吉多所”的地方。他在那里建立了“大圆满教法中心”，广泛地收集苯教文献，建立了苯教文献资料库。他认为，西藏的古代历史文献与苯教发展有很多关系，建立这个中心、这个资料库，是深入研究藏族古代文化史的需要。当然，这与他信奉宁玛派教法，占有许多古文献有关。为此，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藏族古代史话》（共2集，英文）《藏族牧民生活探源》《大圆满教法和汉传佛教禅宗的关系》（藏文），等等。

后来，他几次回乡探家，为建立小学和医疗中心出资出力，受到德格地方领导的关注。最近，他的事业发展到了拉丁美洲，在巴西建立了道场，继续弘扬藏传佛教，拥有一大批信徒。听说身体欠安，令人挂念。我只能在这里，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重振佛教法鼓，利益众生。

（四）高瓦喀活佛·曲吉建才

这是贡嘎山下的又一高人，高瓦喀(Go wakha)寺的转世活佛曲吉建才(Choskyirgyalmtshan)。他是噶居派(白教)贡噶上师门下弟子，又是格鲁派(黄教)扎雅活佛(昌都地区活佛，清朝受封呼图克图，曾在德国出版《藏传佛教艺术史》)的外甥，地地道道的木雅人。他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哄闹，躲过了数不清的无端指责和刁难，一心上进，坚持学习。

我们的第一次相会，是在拉萨。他原在拉萨色拉寺学经，后来性之所至，应聘到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做助手。由于年轻时候的经验积累，兴趣在古建筑上。对于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以及三大寺的辉煌建筑，及其古老的文化积累，久已崇敬在心。他对此细心琢磨、衷心赞叹，同时相信佛教教义中重要的人生观“成、住、坏、空”的规律。他也相信，这些古建筑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必然有颓败和修复的需要。他取得了长期的积累以后，一次次的实践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有名望的古建保护工程师。于是乎，一个又一个西藏古建保护修复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我们在拉萨的相会，非常愉快，充满欢乐。他已还了俗，组织了家庭，有了妻子、儿女。因为我也是贡噶活佛的弟子，我们算是“金刚兄弟”了。

1998年，在美国布鲁明顿—印地安纳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我们又一次相遇了，分别从北京、拉萨到那里聚首。他做了一个十分精彩、令人难忘的发言——《布达拉宫：古建的修复和整容》。依据原始资料调查，彻底建立了这一宏伟的古代建筑的信息档案。近300年来木结构的腐朽颓坏，香火的熏习，鼠啮虫蛀，状况十分严重。这次，国家下决心进行全面、彻底的整修。他肩负重任，既光荣又艰巨。有时要偷梁换柱，有时要托上换下，有时要真正的“顾大体，保局部”。总之，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他在会上，将布达拉宫整修的全过程做了介绍。这是维修布达拉宫的空前的光辉壮举。他的发言，使国外关心西藏的人们十分赞叹。当然，那些不协调的声音，说中国人在破坏藏文化，如何消灭藏文化等等，谣言不攻自破，成为笑料。我们是多么感激他啊！

后来，他深情地邀我去看他拍摄的“贡噶上师故居”短片，我才知道贡噶活佛当年被确认为转世活佛时的家庭情况。简单的陈设、朴素的藏民家庭环境，圈养着牛羊，焚烧着牛粪的茶炊，亲切的话语，保持了藏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行……这一切令我肃然起敬，感叹不已。贡噶上师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我这次是第一次从他这里了解到活佛的出生背景、家庭素养和人文环境。我是多么感谢曲吉建才活佛的努力呀！此外，他还着重介绍了木雅人雕楼的建筑特点。这可以说是已经逐渐藏化了的木雅人保存下来的文化古迹，也可以说是木雅人的原始民族记忆。换句现代的话说，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吧！看着散布在雅砻河沿岸的高耸入云的古代碉楼，可以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狼烟蔽日的战争风云。木雅人的历史，很值得人们去探索。如今他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和许多藏族才俊青年一样，正在和国内外同行比翼齐飞。请接受我这样一个年老的民族工作者的祝福吧！

（五）格桑旺堆和木雅贡布

在贡嘎山上，最早受到贡嘎活佛教导的，要数格桑旺堆（sKalbzangdbangvdus）先生了。后来，他自然地成为帮助活佛教育青年弟子群的最好帮手。在贡嘎山的佛学讲堂里，有他一席之地，那便是与弟子们朝夕晤对的特殊位置。从这里出去的弟子们，有谁不记得格桑旺堆先生亲切的话语？特别是几卷藏文佛典的解读，以及他那勤勤恳恳、从不厌烦解答问题的态度，给人留下温暖和亲切的记忆。

格桑旺堆先生应聘到巴塘去任教了。咳！有话说“巴理塘，强人出没的山梁！别瞎说，那是达赖佛爷出生的地方”（vbav li thang jag pavi lung pa red/zer mi nyanskyabmgonvkhungsared/）。这首口头流传很广的民歌，道尽了巴塘作为七世达赖喇嘛故乡的历史沧桑和人文记忆。格桑旺堆先生来了，带来了贡嘎活佛殷切的关怀。给当地渴求知识的弟子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教泽。在风光绚丽的巴塘，增加了具有异彩的文化风景。当地人说：“关内苏杭，关外巴塘。”多么自豪。格桑旺堆先生功不可没。

一对美国夫妻，希尔顿和他的夫人。知道格桑旺堆先生的学养，细心地跟他字斟句酌，终于把基督教的《圣经》（包括新旧约）逐字逐句译成了藏文。至今，这仍是唯一的藏文本《圣经》。格桑旺堆先生对这一点，从不居功自傲，更不用来炫耀自夸。只是淡淡地一笑：“工作嘛！做了一件工作了！还是帮洋人啊！”

1950年代，经贡嘎活佛推荐，格桑旺堆先生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被安排在预科教学。一批从西藏来的少年，多数是贵族子弟，既活泼可爱，又调皮淘气。格桑旺堆先生是极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他将这一批孩子条理得服服帖帖，接受教育。他开讲藏文的《三十颂》（Sum cu pa）和《字性组织法》（rTagskyivjug pa）。从最基本的藏文文法讲起，逐步深入，同学们受到很好的基础教育。正是由于教育得法，他老先生成为第二届海淀区直选的人民代表。他甚为高兴，就是担心自己看不懂文件，不能直接讲话发言。我被派到他身边做口头翻译，并陪他到海淀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他是仔细听报告，细心审读文件，并对不明白的问题一一寻问清楚，还做了发言。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佩服。他自己总是说：“要好好学习啊，要好好学习啊！”由于自己不懂汉文，就下决心让女儿们——央金和曲准好好学习，来帮助他。

老先生早年出家为僧，后来还俗成家，带着妻子闯荡江湖。在北京，没法安排宗教生活，可苦了老太太了。她每天定时要去转塔、转寺的，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没法子转啊。她只好绕着宿舍去转，一圈一圈，口中喃喃有词：“嗡，吗尼，拜米，吽！”不断地念诵，手持佛珠不停地抠动。人们不了解，以为她犯了神经病，甚至有人以为她是个疯子，弄得很不安宁。后来，老先生带着老太太回西藏了。大女儿央金跟大师兄贡布结了亲，小女儿曲准仍留在北京读书，一切生活重新做了安排。正如一首西藏民歌所云：“当初离开家乡，谁也没有念想；翻过一座座山岭，想起恩重的爹娘！”

贡布师兄，人们习惯地称他为“木雅贡布”（Minyagmgonpo）。说起“木雅”，这是藏语 Minyag

的音译。既是用来称呼一群讲木雅话的人，又指这一群人所居住的地方，人们往往称为“木雅人”或者“木雅地方”，地以人而得名。这是一个颇为生鲜活泼的人群。历史学家经过研究，指其为“西夏王国”的一个支裔。最早的研究者，是邓少琴先生。他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发表过一篇《木雅西吴王考》，后来研究的人多了。其中有著名的西夏学家李范文，他曾从语言入手，推及历史考证，认为木雅是西夏人的后裔。而木雅、嘉戎、西番、吐浑、东女，乃至羌等等族群，是生活在汉藏之间的一个个群体。语言各异，习俗不同，但是由于生活在汉、藏两个大民族之间，深受其影响。台湾史语所的王明珂博士，曾以10多年的精力，投身于羌族社会的调查研究。近在《羌在藏汉之间》书中，发表了她的结论：生活在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较小族群，靠西边的接受了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中心的藏文化，逐渐藏族化。靠东边的，往往接受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汉文化。他们逐渐失去了个性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也就逐渐地变成了藏族或者是汉族的新成员，尽管还留有若干的遗风流韵。她的观点，有点意思，大致是可以接受的。木雅人千百年来，就是经历了这一过程。但是，木雅人保持了若干特点。例如，高耸的碉楼，以火塘为家庭中心的习惯，而且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藏传佛教，并努力争取到宗教的领导层地位。据最近王维强博士的研究提示，藏传佛教格鲁派当政以来，木雅人就有五位获得“甘丹赤巴”(dgavldankhri pa)的最高荣誉。上面提到的贡噶活佛，担任过十六世大宝法王的雍增经师。总之，木雅人是以智慧和才华，攀登了藏传佛教的巅峰。他们都以自己是藏人，是藏传佛教的继承人而自豪。

木雅贡布是光荣地以贡噶活佛弟子的身份，而蜚声海内外的。我们结识的噶玛堪布、都瓦管家、阿旺诺布侍者，以及上面介绍过的高瓦喀活佛·曲吉建才、格桑旺堆老师等等，都是木雅人，而且都是对藏传佛教做出杰出贡献的木雅人。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雅贡布就下山应聘到成都工作了。后来到北京，那时在北京建立了民族文化宫（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成立了民族图书馆。馆藏的藏文典籍，特别有从西藏各地寺庙中请来的古代印度梵文贝叶写本，共约260多包，十分珍贵，可以说是国宝级的珍品。那时，馆方特别聘请一批专家，木雅贡布就是首选人物，来馆着手编写藏书目录，清理副本，工作整整花了三四年时间。

还应说一说贡布和央金的婚姻。他们既是同乡、同龄，青梅竹马，又是老师的女儿和学生，师兄妹结为良缘，十分美满，人人称羡。但是命运捉弄人，作为歌舞演员，央金因为一次演出事故，患了骨骼炎症，日趋严重。虽经多方诊治，也请喇嘛诊断医疗，但回天无力，还是过早的走了，令人惋惜！这时，妹妹曲准毅然决然前来，医治姐夫和父母的伤痛。她决心与姐夫贡布生活在一起，解除他心灵上的伤痛，也了结父母二老的烦恼和忧愁。这样，又一次幸福的降临，使木雅贡布重新燃起生命之火。他接受了妹妹曲准的美意，使这一行将破灭的家庭，重新组建起来。后来，他们陆续生了三个孩子，二男一女。个个都已成才（在民族文化宫、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和在雍和宫经营商业），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寓所里幸福地生活着。

木雅贡布师兄发挥他的才能，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迫害之后，在新的旅程中，他所主编的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藏文典籍全集类目录》共3集正式出版。这是木雅贡布细心锐意地

为 150 多位藏族和蒙古族学者们留下的全集 (gsungvbum) 所作的明细目录 (子目), 实在是空前的大工程, 是最为宝贵地献给读者大众的礼品! 这套巨著由他一手开创, 已正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后面第 4—5 集, 将陆续问世。木雅贡布师兄生前这项最大的贡献, 是献给中华文化宝库的一大礼单。可惜他竟在不久之后, 因病住院。谁料到呢, 一病不起, 与世长辞了。木雅贡布, 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上!

(六) 邦隆活佛

1978 年, 开始了“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从十年噩梦中苏醒过来, 百废待兴。久压在心头的大石, 虽然已经搬掉, 但恐怖的余悸还未尽消, 心头忐忑不宁。这时, 国际藏学界也颇有人倡议和中国沟通, 毕竟藏学研究是离不开中国的。中国在干些什么? 中国藏学还有没有活动? 又有哪些人和事?

人们在揣度着、思摩着, 于是记起了出生于匈牙利的第一个欧洲藏学家——乔玛这位先驱者的事业 (邓锐龄先生撰有一个长篇传记, 载于《民族研究》1984 年第 5 期)。上了年纪的欧洲藏学家们, 组织了纪念乔玛的会议, 第二届就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在筹备过程中, 会议派出了德国两位汉、藏学家邦克 (W. Benck) 和迪特舒 (Diter Shuh)。两位搭档到了北京, 访问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于道泉教授, 表示希望能沟通中国的同仁, 希望中国能派人参加会议。他们两人在会见了于教授之后, 十分震惊于他的多种语言能力和十分敏锐的记忆强度, 希望于先生能赴欧洲参加会议。但是, 于先生推荐了我, 主要因为我年轻 (当时我已经 51 岁了), 而且一直在从事藏族语言、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在西藏工作过, 有鲜活的工作经验。上述两位德国朋友, 作为不速之客来到我家, 说明来意, 我当然是欣然接受邀请。于是, 当年的 9 月初, 我接到邀请书和机票, 急急忙忙办理出国手续, 心中忐忑忐忑, 像在怀里揣着一只兔子, 匆匆地奔赴欧洲——维也纳。要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跨出国门, 第一次和海外同行打交道!

在会上, 我见到了李方桂教授夫妇、张琨教授夫妇, 他们两位是我的师辈长者, 我对他们表达了极为深切的崇敬和久已仰慕的感情。又见到了当年在中国留学的捷克学者高马士 (J. Kolmas) 先生, 他是于先生指导的外国留学生之一。大跃进时期, 校内搭起小高炉, 后院“大炼钢铁”。高马士先生直言不讳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 是钢? 有什么用? 像于道泉教授这样大专家, 被动员来搞这种事, 简直不可思议, 是极大的浪费!” 后来, 院系领导人说: “有些修正主义言论, 大家要提高警惕, 要注意啊!” 因此, 他在中国不到三年, 就颇不愉快地离开了。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以为是在梦中。他非常关心于老的健康, 以及教研室同事们的情况, 我一一做了回答。这才注意到他近些年来藏学研究的成就——《白居易代表皇帝致吐蕃君臣的四封信》《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萨迦格言〉捷克文翻译》等等, 令人钦敬。还有, 曾在北京共事 5 年之久的藏族学者阿旺顿珠先生。他在 1957 年回藏后, 随着大流来到了印度、美国, 跟戈尔斯坦 (M. Goldstein) 教授合作编写《藏英词典》和《英藏词典》。也是多年不见了, 谁也想不到在这里重逢。

但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会见了邦隆（sPang lung）活佛。他是那么年轻活跃，充满了朝气，热情而慷慨。比方说，我是初出国门，不会使用投币电话，是他教我如何使用它，如何操作饮茶机，如何搭乘公共电车，等等。虽然都是琐碎小事，但确实叫人感到放心、踏实、安全。

在会上，我提交了两篇论文——《藏语声调的起源和发展》、《南宋恭帝入元后事迹考述》。应该说，还是可以过得去的。在发言时我离开了英文稿，用藏语向在座的列位藏族学者致敬，表示故乡来人的关怀和思念。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引起了全场的惊诧，人们想不到这家伙居然讲藏语，令人既惊且喜。尤其是几位活佛们，十分高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跟藏族学者拉近了距离，邦隆活佛，旅居巴黎的噶尔美先生，从印度来的扎西才仁先生等等，都一见如故了，血浓于水嘛！邦隆活佛提供的帮助是无微不至的，使我免去了种种孤立感的烦恼。可以说是“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感受。当然，还有李方桂、张琨二位师尊的关怀，我会另处表述。

我与邦隆活佛相交以来 30 年了，就像酥油和茶水融合一样的友谊，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我才知道他出生在昌都地区的贡觉县，5 岁时被确认为三世邦隆活佛的转世灵童，被邀请到云南中甸松赞林大寺坐床供养，成为该寺八大活佛之一。7 岁时，被送到拉萨色拉寺“迈扎仓”学经。邦隆活佛佛座，原来就有一所修学道场在色拉寺附近。接着是一系列的苦修苦读，通过一场场辨经和述论，邦隆活佛有他特别的秉赋，在色拉寺里逐渐地显露了头角。终于在 1959 年春节，也就是藏历新年，拉萨传召大会上，摘取了桂冠，取得了头等格西，就是拉然巴格西学位。同时取得这一荣誉的，还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和甘丹寺的波密活佛等人。波密活佛，后来担任西藏佛教协会会长，也当然担任了十一世班禅活佛确认过程中金瓶掣签的主持人。与达赖喇嘛同榜高中，给邦隆活佛带来极大的荣誉，真正是蜚声藏区而且誉满全藏了。

接着，发生了 1959 年的“拉萨事件”。在那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中，随着管家的安排，邦隆活佛漂流到了印度。不久，1960 年他转道联邦德国，进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攻读，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师从最著名的汉藏学家傅海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他的天资聪明，攻克了语言障碍，最终以《佛典戒经中的故事辨析》，取得了博士学位。与同学于伯赫（H. Uebach）博士一起，留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工作。他们共同接受的任务，是编辑一部超大型的《藏德大辞典》。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世界上已有的藏英、藏法、藏日、藏汉几种大辞典，还有若干小型辞书的参照系上，编辑《藏德大辞典》的任务更为繁重。他们一直持续做编辑工作，历久不懈。直到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邦隆活佛对国际藏学会发展的努力。1981 年维也纳纪念乔玛的藏学会后，紧接着 1982 年夏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这是由于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参与，研究的大多是古典的语言、宗教和历史问题。针对李盖提、石泰安、李方桂一批老先生所操办的会议，青年藏学新锐们着意组织了这次会议（前两次在瑞士和牛津举行，人数不多）。其所以特别标明青年藏学家，不言而喻，是意在提倡和鼓励，希望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南亚研究所威曼教授担任主席，泰勒教授作主题发言，巴卜拉·阿齐兹博士和马修博士任秘书操持会务。邦隆活佛和我，都接受了邀请，分别到纽约会合。那次会上，又结识了不少朋友。瑞士的阿米·海勒、英国的克拉克，后来都经常到中国来，成为好友。我在会上提交的一篇文章，介绍用藏语在拉萨和北京、上海演出的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全过程，西藏话剧团杰出的藏族演员，以其精湛的演技，用十分精确的藏语把故事引入高潮，惟妙惟肖。最后，我的结论是：藏语可以表达世界上任何文学名著，毫无愧色！引起了会议同仁的极大兴趣。看来人们也约略地知道，在西藏还有不少新鲜事物，并不像西方社会所宣传那样满目荒凉、遍地疮痍。就在会议中，有一位中国的网球选手胡娜，在美国宣布她选择了自由，就立刻轰动了。有的朋友问我做何感想？我说：“人各有志嘛！中国之大，人口众多，走了一个胡娜什么的，没有什么奇怪。祝她好运吧！”

会议期间，邦隆活佛和于伯赫博士被推荐为下一届藏学会在慕尼黑举行的承办单位的召集人，大家都满怀信心在慕尼黑再见。

很快我就收到了通知，会议提供全程的机票。而且，由东噶·洛桑赤列活佛和我两人参加。时间飞快，1985年秋天，我与东噶活佛如期到会。另外，还有民族研究所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莲生。这样一来，中国就有三位代表与会了。这次会议很有意思，在我们向会议报到之前，都聚集在邦隆活佛家里，按规矩应该叫“邦隆拉卜让”，或者“邦隆仓”，意思是佛爷的府邸！他的夫人噶玛措姆啦，是一位非常体贴丈夫的、好客的女主人。那一天从印度来的、北欧来的、美国来到、中国来的、各路藏族代表和藏学界的老朋友们，差不多有20来个人，齐集邦隆府邸，到处欢声笑语。他的夫人蒸包子招待客人，一笼一笼的包子，在客人手中、口中欢快享用，真正体验到邦隆府邸的藏式招待。这期间，我还见到他的老管家，一位勤勤恳恳的老人，轻声慢语，还向我们打听云南中甸家乡的生活近况，看来老人也牵动了乡愁，眷恋着中甸的乡亲呢！邦隆活佛忙着招待各方来的代表，忙上忙下，不亦乐乎。达才活佛是达赖喇嘛的大哥，他从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专程赶来。他是语言大家，语通蒙、藏、汉、英，遍游欧、亚、澳、美的学者，见多识广。他也很佩服邦隆活佛的组织能力，赞不绝口。这就是邦隆一心做事、举重若轻的风格嘛。

在这次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青海两大湖扎陵、鄂陵位置考察》，是主要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两位佛爷进京的路线记录勘定的。“名从主人”是论文的主要根据。这次会议，邦隆活佛做的很辛苦，会后不久就把会议论文编辑、印刷、出版，显得德国人的工作效率很不一般，为会议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后来，1986—1987年间，我应聘到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任教，跟邦隆活佛的来往就更多了。一次，我、老伴和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女儿，一起到了慕尼黑，在邦隆活佛府邸盘桓了近一个星期，女儿跟邦隆夫人成了好朋友。而邦隆活佛人在德国、心系家乡，几次回到云南家乡探亲，对当地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植树、保养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欢迎他“常回

来看看”！

2010年夏，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将要到北京旅游，令我喜出望外，连忙按电话提供的“中华民族园”酒家去会见。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旅行团由于路上堵车，才回到酒店，这时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同仁范德康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沈卫荣等人，都到这里等候。那一晚欢快的感情和场面，不用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邦隆夫人噶玛措姆啦也在座，更令人欣喜。在这里，他介绍了在瑞士的贡巴萨活佛与我们见面。那一晚畅叙离衷，十分欢快。他说下一个月要去云南中甸一行，刚好，我们也有计划去访问中甸，相约在那里会合。

后来，我们在成都完成了旅行计划，就乘飞机去了丽江，而中甸的迪庆州州长刘家训先生派了车，到丽江来接我们。一路秀丽风光，不用说多么美了，伟大的祖国千山万壑，一脉长江越过山梁，顺流而下，遇山逢岭，千回百转，终于到达中甸了。在这里，又与邦隆活佛和于伯赫博士会合了。当地最雄伟、最著名的松赞林大寺，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整修扩建，沿途熙熙攘攘、车流不断，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提到优先考虑的地位。几天后，他和于伯赫博士沿着茶马古道去了拉萨，尽情享受并亲身体会了一次古人旅行的乐趣。

没想到今年，我和老伴都已年逾80，又到欧洲领略了一番家庭的亲情，更不失时机到慕尼黑与老朋友相会。在他府上，在意大利餐馆里，又见到了于伯赫博士。我们出其不意的到访，确实令人惊奇、羡慕和赞美。就是这样的亲情和友情，牵动着我们的心。而邦隆活佛全家，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和孙子，都生活在欢快、幸福之中。见到这一切，美好而幸福的一切，我默默地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七）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坚赞

扭转乾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全新的政治局面，人心望治，天下归心。“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就在这时，全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31号文件，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的。当时，足见西藏问题受到何等的关注。

为了落实中央31号文件，决定组织一个以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为首的，有万里、杨静仁、赵振清、阿沛·阿旺晋美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进藏工作。我由好友胡德平同志推荐，跟随工作组作为随行人员进藏工作。关于这件事，我会另文叙述。这里且说1980年5月底、6月初，完成了任务，工作组的部分人员离藏返京。专机途经格尔木作一次休整，然后登机回京。在机上，我向耀邦同志告辞，并请耀邦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些意见，作点指示。耀邦同志说：“王老师，辛苦了，你回到北京后，办两件事：第一，你跟你们学院的领导说一下，把我们在西藏的工作进展跟大家传达一下，并且，你要到国家民委找杨东生同志说说，向民委系统的干部传达一下，必须招呼平措旺阶同志参加，而且，你对平旺说，关于他的案子平反落实政策，是我亲自过问处理的。然后，专门向班禅大师和阿沛夫人分别作专门传达，你是讲藏语的，说起来方便。第二，你要和杨东生同志谈一下，我建议组织一个研究机构，专门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备咨询，没有这样的研究机构是不行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成立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回京后，我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分别向中央民族学院和国家民委的领导作了汇报。杨东生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是藏族里参加革命最早的那批优秀人士之一，藏名协饶顿珠。他听了汇报后，迅速认真地组织会议，按耀邦同志的指示，一一办妥。当我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传达时，见到了平措旺阶同志，紧握双手，把耀邦同志交代的话告诉了他。他眼含泪花，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接着，我就在中央统战部二局薛局长和秘书张蒙娜二位陪同下，前往北京医院去看望班禅大师。当时，大师在北京医院治疗、休养，我们愉快地见了面。说起大师嘛，我早就认识了。

那是1951年春天，正值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艰苦谈判，冲破了种种阻挠和干扰，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于5月23日在报上公布。我是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准备投身到西藏工作的一名学子，从南方来到北京，进入正在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属于当时号称第一班的藏语文培训班。我们为协议的达成而鼓舞欢欣，积极准备进藏，投身藏区的解放、建设事业。班禅大师的名义，我是知道的，那是与达赖喇嘛齐名的西藏领袖嘛。一天，十世班禅大师，他本人来给我们做报告了。嚯！他刚刚13岁，身材魁梧，面目清秀，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被确认为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在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特使，会同副使马步芳，册封他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他以十世班禅的身份，到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商谈。最终，《十七条协议》中，就有三条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条文。当时，《人民日报》欢呼：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了，汉藏人民团结起来了，藏族人民内部团结起来了！这样，班禅大师就自然步入全国关注的中心了。他以13岁的少年，给我们作报告。虽然只讲了五分钟，可是翻译计晋美扎萨却用了半个多钟头解释大师的深奥的密意。从那以后，大师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护送下，一行浩浩荡荡越过冰封的青藏雪原，跨过一座座雪山草地，到了他的精神家园——西藏。

十世班禅大师入藏后，抵拉萨，首先隆重地到布达拉宫，与十四辈达赖喇嘛会见，进行了十分庄严的“碰头礼”。达赖、班禅相互承认了，这可是藏族人民久已盼望的友好团结局面。为九世班禅长期在内地漂泊，居无定所，而藏族人民被这种人为分裂所困扰的状况，作了历史的了结。班禅大师光荣地回到了他的故地日喀则，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和尊严。光阴迅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都以西藏人民代表身份，晋京参加大会。这时，见到班禅大师，人也长高了，体格更为健壮了，正是长知识、长才干的16岁呀！我是大会翻译处的工作人员，见到了大师，甚为高兴！大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喇嘛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共同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形势一片大好，他们二位各自率领了自己的团队，分别到全国各地参观。那时，真正是莺歌燕舞，天下太平啊！

1955年初，正是春节，与藏历新年在同一天，这是17年中三次的“喜相逢”佳节。毛主席在除夕晚间，忽发奇想：“我要去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拜年！”这下子，国家领导人总动员，一起到了达赖喇嘛住处，会同班禅喇嘛，齐集一堂。于是，人们见到了那一幅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毛、朱、周、刘、邓、陈诸位，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分坐两旁合照。厅内一片欢笑，祝贺新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祝贺声中，传递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人们喜笑颜开，充满了欢乐、愉快和喜庆的希望！这可以说，是我国汉藏关系史上最美好时期的纪录。

班禅大师和达赖喇嘛，共同应邀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纪念释迦牟尼诞辰 2500 周年的活动。班禅大师如期返回西藏。达赖喇嘛则在某些势力的劝诱、吓阻和挑唆下，迁延了一段时间，经过周恩来总理赴印度亲自开导后，也终于回到了拉萨。历史的演进，往往不以人们美好的愿望为转移，常常有某种燥热的力量在推动。内地发生了反右派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斗争，紧接着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等一连串的过左的躁进运动，闹得全国不得安宁。于是，在此形势下，川、甘、青、滇藏区进行了过左的民主改革，把汉地实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向藏族地区推广，激起了形势的陡变，极不安宁。各地发生多起案件，引发了藏区上层领袖人物的不安。终于在 1959 年 3 月下旬，发生了“拉萨事件”。那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势在必行。达赖喇嘛被劫持外逃印度，中央随后宣布实行民主改革，边打边改，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

班禅大师和他领导下的后藏日喀则，则是没有参加叛乱的安定地带。而在那样的泾渭分明的关键时刻，班禅大师大义凛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初衷，决不动摇，在困难时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赢得全国人民的尊敬和倚重。他坐镇拉萨，处理公务，令人敬佩。

后来他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征求对西藏工作的意见，他收集了各方面的反映，上书中央，本来是一件广得人心的好事，竟然被错误地理解为“猖狂进攻”。因而，也遭到了极左思潮的严厉批评，先是“背靠背”，后来发展为“面对面”的斗争，实在太不像话。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才调他进京“学习”，保护起来。当年，我虽有机会在日喀则工作，但很少能见大师一面，心中常常牵挂着大师的生活和健康。我在萨迦寺和山南一些寺庙里阅读典籍时，往往联想到大师的处境安危。

有一次，在扎什伦布寺里，见到我的学生王凤岗。他告知我，在扎寺文物室里有一幅古画，很值得注意、保护。我查询后，知到是一幅唐代密宗的坛城图，很有意思。后来在北京，我见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谈到了这幅唐画。朴老十分高兴，就向班禅大师提出，要求借观借观。班禅大师痛快地答应了，他利用回藏的机会，把那幅画提了出来，郑重的交到朴老手中，说：“这是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献给中国佛教协会的礼品。”为此，朴老特地摆了两桌素斋，邀请启功、顾铁符等几位名家前来欣赏、鉴定，我也敬陪末座。这幅唐画，原有甲、乙两幅。其中一幅落入美国人“乙都笃”手中，不知去向。这一幅，则被日本人柏原学而收藏。柏原氏还为此画专制了一个红木匣子，外面篆刻了藏传原委：系空海大师，在唐朝长安的青龙寺随惠果法师学密时，得到此画；一幅流入美国，现存一幅经清水寺辗转到了他的手中，云云。启功先生仔细观看后，说：“这是唐画无疑，但到日本后，经过装裱，看看绫边便可知道了。”大家都赞叹不已！后来，由周绍良居士根据画面坛城的布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音》杂志上。大家对于班禅

大师宽厚仁慈、慷慨仗义的精神，极为赞叹。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厄运和灾难。就在1966年8月里，以几个“农奴战”红卫兵的名义，这些人实际上是一批极左思潮下涌现的疯狂打手，居然发动了斗争班禅大师的大会。会场就在专门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的中央民族学院4号楼前的广场上，绝对的讽刺。人们好奇，前来观看，据说有十万人之众。我已是牛鬼蛇神，被关在“牛棚”里，听到这个消息，惊得丧魂落魄，好像真是天塌下来一般。这怎么得了啊？这怎么得了啊？天下大乱，鬼神难安了！班禅大师以无比的定力，度过难熬的一天一夜。第二天，周总理得讯，大为震怒，立即下令，由警备司令部把人接了回来。从此，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接近。班禅大师幸而度过了天昏地暗的岁月，荒唐的岁月！

到了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由他提议，请全国政协安排一些同志出去看看，学习学习。于是就有费孝通先生、董其武将军、宋希濂将军、郑洞国将军、杜聿明将军和班禅大师等人组成的政协学习组，到成都、武汉等地去参观学习。当时，政协人员还不敢用视察、考察的名义。费孝通先生告诉我，班禅大师好极了。在列车上帮助乘务人员扫地、送水、扶持老人。每到一处，立即打电话家中，告知老母亲一路平安，让老人放心，真是个好孝子。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位董其武将军的随侍，也是他的外孙女李洁同志，年轻人嘛，跟大师在一路上说说谈谈，十分投机，就成了好朋友。此乃后话。这也就是她从301医院的护士转业到全国政协，被安排在班禅大师处任生活秘书的由来。

现在，回到在北京医院里向大师传达耀邦同志关于在西藏落实31号文件的指示。耀邦同志说：“要以目前的契机，团结全体同志，搞好民族团结，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富裕的新西藏。”并提出若干条具体措施，保证文件的落实。我把耀邦同志讲话时激动的表情、听报告同志们积极响应的情绪，介绍给大师听。他当下推被而起，比划着说：“党有这样好的政策，就是用棍子赶我们，我们西藏人也不会走的。”薛局长听了，也很感动，对蒙娜说：“把大师的话，记录下来，今晚就上报中央！”

为此，我和大师更进一步地接近了。一次，在印度的阿乔活佛，他是四川的嘉戎人。曾在欧洲教过书，属于格鲁派在印度的甘丹寺的一位掌印喇嘛。他到中国各地访问，并携带姐姐等家庭成员六人，在内地采购，并在尼泊尔经商。因为我们在欧洲相识，由我陪同、接待，并且约定拜见了班禅大师。就在东总部胡同57号的佛邸里，大师一见面就说：“阿乔仁波且，你记得吗？当初还是由我经手确认你为阿乔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啊！”阿乔连忙点头称是：“是班禅仁波且的恩典！”班禅大师让侍者取一条哈达出来赠给阿乔，并说：“你们在海外传播佛教，也是好事。但是，没有必要到使馆门前闹事，扔个西红柿，扔个鸡蛋，有什么用？徒然让人生气嘛！佛教应该是沟通国内外的桥，不应该是阻碍沟通的墙！你说是不是？”一席话说得客人点头称是。我觉得班禅大师真正会做工作，说到点子上，令人心服、口服！

一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罗竹风先生，列出“历辈班禅大师”和“当代班禅大

师”两个词目，指定由我来撰写。我在前一个词条里，侧重由一世班禅凯珠杰·格来贝桑在宗喀巴处继承学术的伟大成就，谈到四世班禅罗桑曲吉坚赞做主寻找四世达赖转世灵童（五世达赖喇嘛），并与他一起派员到奉天（沈阳）寻求支持，而与满洲贵族建立新关系的渊源。最后，在满洲人入主中华，成为大清帝国皇帝，满、汉、藏之间，以藏传佛教作为纽带，顺治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授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成为清廷册封达赖活佛的先例。又介绍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晋京，向皇上祝贺寿诞，此为班禅系统与皇廷直接交往之始。以及九世班禅被迫流亡内地，在各地弘法传教，最后在玉树圆寂的历史，强调了班禅一系活佛与内地的亲密关系。后一个词条“当代班禅大师”，就是十世班禅·曲吉坚赞本人，幼名官保慈丹（mGonpotshebrtan）。班禅大师看了词条草稿，表示不同意，并提出修改意见。他说：“官保慈丹不妥。我不喜欢用‘官’字，我不喜欢官长、官僚、官威、官气等等，我喜欢做贡献的贡字。要改，要改！”我说：“大师，您的名字是从档案中摘抄下来的，不能改，改了就不是您了。”最后，用“旧译官保慈丹，今译贡保慈丹。”他才满意，我才交了卷。

为了这些词条的撰写，与大师多次接触。在班禅大师的府邸里，常常与他交谈很久，并在府上留饭共餐。有时，生活秘书李洁在座，我们三人谈话，就完全用汉语交谈了。一次，班禅大师邀请我和妻子一起到他佛邸吃饭。初进门，大师就十分殷勤地接待，并亲自削苹果给我的妻子。妻子不好意思，不敢接，我说：“赶快接下，谢谢大师，连苹果皮也要接过来，按藏族规矩，添福增寿，以作纪念！”大师令人感动的是，居然请出他的父母——佛公、佛母来陪我们用餐。这可是藏族中，尤其是活佛喇嘛中，最高的礼仪了。我连忙称谢，惶愧不敢。大师笑着说：“友谊，友谊！”至今难忘的隆情高谊呀！

1989年初，决定修建历辈班禅大师的金塔。本来大师邀我同行，我因有出国任务而未能前往。谁料到，就是这一次，竟成了永远的诀别，永远的伤痛啊！2010年，在无锡的世界佛教论坛上，十一世班禅大师发表了精彩的论文，论述佛教徒对和平事业的责任。会议对他以英文向世界佛教徒发出的庄严号召，十分惊喜和欢迎。他经了寻访、确认，又经过庄严的金瓶掣签选定，再经过十多年来教团严格的培训，已经茁壮成长了。我与他初次会见，感到前世因缘，今生重会，一代代友情、师恩，滋养着友爱的花朵。而它永不会凋谢，必将一代代传承下去。

原载《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